

▶▶▶ [上接 8 月 20 日 A4 版]

为什么说西方国家也能从中国经济模式中受益？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速低于 1929 年后同期增速

■ 英国经济学家、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现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 罗思义

宏观调控和投资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一事实,《华尔街日报》准确描述道:

“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

这种经济结构的优势显而易见。比如,2016 年初中国经济增速创 28 个季度新低——回顾当时的国际背景,当年是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极为低迷的一年。当时中国推出政府投资计划,同年 4 月政府投资同比增长 23.7%。这有助于确保适当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种连锁反应,这种增长刺激了私人投资,同年 11 月低迷的私人投资开始加速。这说明,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刺激私人投资,即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对立的。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也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中国不是用管制手段调控经济,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可利用政府投资避免投资严重下降(为避免经济过热,中国也可减少投资),解释了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原因。但为何西方不使用这种手段避免其投资严重下降,并导致陷入新平庸呢?

原因在于政治层面,源于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结构,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西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政府资本而非私人资本调控总体投资水平的局面,对坚持私人经济利益必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虽然这种手段可克服新平庸,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准备实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却令他们不可能实施凯恩斯的政策,甚至在 2008 年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的理念。相反,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远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接近凯恩斯所设想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因为允许政府控制投资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因此需要利用凯恩斯所分析的政策工具,而这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不能的。尤其令人讽刺的是,虽然凯恩斯明确希望拯救资本主义,但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无法运用他所建议的工具,反倒是中国能。邓小平和陈云的设想不符合凯恩斯的框架,但凯恩斯的设想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框架内

可得到灵活实施。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这些也明确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中国近 40%的投资是由政府实施的,而没有哪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如此。正如上文详细分析所示,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抛弃了 1929 年后苏联模式推行的管制经济。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以没有顾虑地同时利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正如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或者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强调政府的市场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主席就后一点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用更通俗的说法来说,就是正如习近平 2015 年 9 月首次作为国家主席访美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时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因为独特的经济结构,中国可以同时运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没有这样的结构。”

这种运用“两只手”而非西方纯粹依赖私营企业之手的实际效果,可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空前成就,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优于西方国家中看出来。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即是说,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利于中国经济,都是“好猫”。但西方只坚持私营企业才是“好猫”,导致他们陷入新平庸。

概括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印证了中国经济手段和理论的正确性是一个正面例子,而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则是一



个负面例子。

国际影响

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原因。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是过去五个世纪存在的第三种主要经济模式,前两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和 1929 年后苏联建立的管制经济。中国的这一经济制度并非为推翻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回归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为十九大强调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可确保中国没有问题与危险。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美国新保守派可能寻求实现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美国新保守派真得逞的话,那么这对中国乃至全人类将是一种打击,并且中华民族将遭受沉重灾难,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一样。这将是 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灾难。

鉴于此,十九大强调要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也凸显了 2018 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应指出的是,除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乏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自立性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但问题是,大多数国家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其他国家能否机械照搬中国经验?

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分两部分来回答:

首先,中国的实践成就就会鼓励其他国家。其

他国家不能照搬中国,但可以借鉴中国经验。

其次,虽然改革开放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而成的,但运用西方经济学术语也能解释。

下举例说明:

●马克思是在密塞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推翻密塞最重要的结论。

●这也说明,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凯恩斯理论框架内很容易理解。

●与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相一致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可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框架内得到解释。事实上,林毅夫已经指出过这一点,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在西方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综上所述,虽然改革开放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而成,但在其他理论体系中也得到解释。因此,在采纳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前,其他国家很可能已领会改革开放理论。

根据中国自身经历,很容易看清国际形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引领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但中国共产党从未说过它是引领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力量,反而呼吁与中国一切爱国力量携手合作。现在,除了政府对政府关系,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与许多国家的政治团体大规模对话。比如,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吸引了来自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近 300 个政党与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实证研究证实,即其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他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流派在他们准备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前,事实上已经开始接纳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因为这种合作案例可以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其他流派与经济政策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实证分析帮助。

事实上,后一过程已经在行进中: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日益明显,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框架的兴趣日益增加。比如,非洲一些国家就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就公开承认,其正在向中国学习。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自借鉴中国经验后,其经济便开始快速增长。还有一些事例,比如虽然印度不承认借鉴中国,但事实上用行动表明了立场——印度总理莫迪任命中国问题专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Arvind Subramanian) 为首席经济顾问并非偶然。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新平庸的累积效应,导致其内部政治动荡和两极分化加剧。这在 2016 年达到顶峰,同年 G7 集团 GDP 同比仅增长 1.4%。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动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2016 年极为低迷的表现后,2017–2018 年发达经济体必然出现周期性复苏,2017 年 G7 集团 GDP 同比增长 2.0%便是明证,但这不足以稳定政治形势——围绕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冲突仍在持续;英国脱欧公投导致的混乱仍在继续;德国政治动荡蔓延,甚至一度难以组阁;意大利大选无政党赢得多数议席。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兴趣日益增加——这其中最明显——波兰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波兰采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战略理论。因为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政策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加。

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兼具中西经济理论优点,其他国家应尝试借鉴中国经验。

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起点。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87……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事实充分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的话。意即:

●改革开放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改革开放是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全人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经济发展事实,这是为何改革开放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促成了改革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切断中国与其他经济理论与流派的联系,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可以说,它是忠于事实的最具连贯性、最具发展性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经济结果与经济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四十年不仅是中国实践成果的胜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完)

▶▶▶ [上接 A3 版]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

系统性再论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策责任的分级模式,让责任模式回归到“谁借谁还”的风险承担的范畴之内,倒逼各级政府 在举债谋发展时,量力而行、有多大财力制定多大的发展目标,推动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探索地方政府破产制度,要明确:财政破产不等于无政府,政府对治安、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事项继续提供服务和保障;金融市场要在债务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打破刚性兑付,投资者承担地方政府破产的损失,形成投资者主动甄别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和信用等级等的正向激励,倒逼地方政府规范财政运营管理并提高透明度,切实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强化问责,在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中加入财政管理绩效的指标,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要求。

此外,还应落实同股同权,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垄断性行业。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有不少优质资产,但由于地方政府遵循类似企业经营的理念,在缺乏破产约束的背景下缺乏用优质资产市场化折现或融资的意愿。要真正落实简政放权,让民营资本参与到垄断性行业。目前我国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关卡仍然难以逾越,部分领域即使开了一道口子,但背后还有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应该抓紧制定关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要求。同时,实施更具包容性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垄断行业与民间资本合作机制,避免“只让出钱,不让发言”的不平等合作方式,努力做到同股同权。既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补充财力,又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上升较快,且可能存在低估。2017 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普遍存在通过借贷筹集首付的行为,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如蚂蚁“借呗”、腾讯“微粒贷”、京东“金条”等产品的借贷未计入居民负债,我国居民杠杆率可能更高。

居民部门负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借贷是用于满足购房需求,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明显扭曲。当前一、二线城市严格控制,三四线城市政策相对缓和。一、二线城市市场供求矛盾并不直接反映在价格上,而是反映在量缩价稳、推迟网签、价格失真、库存虚高等方面;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补偿,消化了库存,市场热度高,但容易导致盲目乐观。如此一来,居民的资金流向三、四线城市买房,这是泡沫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体现。

如果不完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只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只是把一些问题暂时掩盖了,并没有真正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并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持续攀升。一是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土地当量市场,这是既保持 18 亿亩的耕地红线,又实现土地市场化供给,增强供给弹性,适应城市化、区域化发展,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唯一出路。随着土地市场化,进一步改革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实现土地供给市场化。二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应由人大授权,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可负担、含存量、逐步实施、激励相容”的原则,选取部分城市和地区进行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也要鼓励各地探索适合本地的房地产长效机制。

(六)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

市场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养老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2017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90199 万人,2012 年以来持续 6 年下降。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增人口的利好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生育意愿和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往往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养老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引导养老储蓄投向长期投资,为居民提供有力的养老保障是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然而近年来,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缺陷不断暴露。一是个人账户空账。我国名义上采取“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但由于个人账户是空账,资金已被挪用于发放当期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在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背景下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2005)认为,现收现付制不仅不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还会“挤出”个人储蓄,降低投资和产出。二是养老体系“碎片化”,压力过度集中于第一支柱。我国养老金体系一、二、三支柱(分别对应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分布为 79%、19%、9%。二、三支柱占比极低,使得养老压力集中于社保基金。2016 年,美国养老金一、二、三支柱分布为 22%、39%、39%。养老基金投资范围受限,在引导资金投向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以往的养老金投资政策过度追求“安全性”,受限于投资品种太少,收益十分微薄。过去,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除了留足一定期限支付外,全部只能购买国债和存银行,年化收益率只有 3%左右。相比之下,从 2007 年至 2017 年,房地产的累计收益率高达 766%,黄金的收益率为 106%,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为 97%,企业债指数收益率

78%,上证 50 指数 58%。过低的回报使大量储蓄不愿投入养老金,转而投向房地产进行短期投资。四是全国统筹,缴费的正向激励不足。全国统筹,以盈补缺,会挫伤养老金盈余省份的缴费积极性,也会降低亏空省份弥补空额的动力,形成不缴、少缴亦享受养老,“养懒人”的负向激励。

改革完善养老金体制,应充分认识养老金具有社会保障和金融中介的双重属性,重视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融资功能,养老金通过引导养老储蓄投向长期投资,既实现基金的收益性,提升养老金的吸引力,又能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公司治理的改善。

第一,做实个人账户。由现收现付转向基金累积,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缴多得”的正向激励。此举“一石三鸟”:一是强调个人养老责任,实现个人养老金责任和收益的良性互动。二是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据估算,2020 年我国 GDP 将达到 100 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 200 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金融资产将用于养老,账户规模大概 60 万亿元。其中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规模余额 40 万亿元。如果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并假设 20%配置在股权融资市场,资金约有 8 万亿元。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金长钱与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三是发展机构投资者,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养老金的第二、三支柱,补上短板。(待续)